



## 清明心语

□ 李东平

爸爸,转眼又到清明时分,可是疫情当前,我无法前往高邮给您扫墓。

爸爸,疫情无情人有情。感谢高邮市烈士陵园的朋友们,让我能够再次隔屏看望您。三月以来,高邮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烈士陵园管理处把烈士祭扫工作作为工作重点,他们主动联系各位烈士,安排专人对接,协调网上祭扫、代为祭扫、预约现场祭扫。

爸爸,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置办了鲜花、花圈、花篮,墓区碑墙干净整洁、

题字描金一新,陵园内外秩序井然,庄严肃穆。

爸爸,高邮市烈士陵园中有1670位烈士,有战友相伴,您就不会寂寞了,您说是吧?

爸爸,芦苇荡再也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已是人民的幸福家园。高邮湖上花海景区,一片金黄,美不胜收。

爸爸,高邮的花美人更美。“请党放心,战疫有我!”青年志愿者们成为疫情防控一抹亮眼的志愿红。高邮全

市有5000余名团员青年,继承先辈的革命传统,在防控一线书写着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为疫情防控,贡献着青春力量。

爸爸,您的精神感染着我。1998年我成为江西省新四军研究会的志愿者,先后担任研究会宣讲团团长、研究会宣传委员会副主任、研究会副会长、研究会顾问。

爸爸,您的精神感染着我,我自己立下了这样的座右铭:

心甘情愿地做应该做的事,无怨无悔地走应该走的路,坦坦荡荡地做应该做的人。

爸爸,我至亲至爱的父亲,我想您!

## 徐老师

□ 戚晓峰

从妹妹小红那得知徐庆文老师去世的噩耗,非常震惊,能感觉到妹妹当时也一样的悲痛。瞬间,想起我们两家同住在城墙头上的那些时光。

不知什么原因,印象和记忆总让我停留在徐老师的一张黑白照片上,三十出头,鸭蛋脸,两条小辫,黑框眼镜,朴实干练的外形是我认为标准老师的模样。

徐老师苏大英文专业毕业,教英语。我没上过她课,倒是常看到她在家备课。她平时不怎么跟我们说英语。有N个学生在我面前夸奖过她。一位学生从她的教室路过,一耳朵就能听出她与众不同的教学风格。她爱人李仲明老师英语在高邮Number One,很多人讹传他们俩吵架都是英文,好像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说明他们的英语水平。李老师快人快语,有脾气,较严格,但没有听过他们吵多少架,生活中有点小摩擦或是用英语交流在所难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次他人没到家声先到,风风火火地用无锡话边走边喊:“徐庆文,徐庆文!”一天要听到很多次。徐老师性格柔弱,不多话,较严肃,浓浓的南京口音慢腔慢调,一般不跟人争、不与人吵,她笑起来嘴角就像可爱的括号,温和而坚定。

作为邻居,作为学生,作为晚辈,我们相处了很多年,每次经过徐老师家,都会飘出她美妙的女中音,那些歌声曾一度模糊了我对她专业的认识。纯正的音色,更像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年代,她就是我心中的歌星。估计李晔、李旸的艺术细胞遗传妈妈,只要新歌出来,李晔会反复听收音机速记歌词,而后再一遍遍地和徐老师学,等李晔会了,回头再教我们。那时小旸已七岁,常常对着镜子,兰花指摆出戏剧造型,有模有样。徐老师总用欣赏的眼光边看边笑。

我大李旸几岁,那时比较贪玩,他偏偏又喜欢黏着我,后来怕影响他学习,又怕被徐老师怪,能避开我尽量躲,每每经过他家时总是快闪,但“小尾巴”总会诡异地出现在我身边。

我高中毕业后去当兵,每次给妹妹写信,都会带上一笔,用特有的表达方式鼓励李旸学习。一次,我穿着军装探亲从徐老师家门前路过,小旸笑盈盈、激动地冲上来拉着我的手左摇右晃,徐老师也赶过来:“乖乖隆隆,成大小伙了,不错,成熟啦。”

走上工作岗位后,徐老师看我时常发表一些小文章,常会给予肯定。一次,徐老师术后回高邮,我开车接她,当时,车内放着抒情音乐《有一天,我看着那深蓝色的天空》,她赞扬道:“你还听卡雷拉斯的东西啊,有品位。”我在惊叹徐老师鉴赏力的同时,心中装着满满的幸福。

徐老师不光唱歌好,也精于器乐。她有一管箫,瘦瘦长长,荸荠色,尾部一个精致的小彩挂,小旸偷偷拿给我看过。这管箫徐老师平时不吹。一个炎热的夏天,四家邻居围坐在她家门前纳凉,她那天高兴,即兴演奏了一曲《忆江南》,凄婉的箫声缠绕在深邃的夜空,让人有种“情到深处泪一滴”的感觉。那晚,妹妹小红一直沉浸在那婉转动听、情意绵长的乐曲中,睡觉前床肚里看了又看,查了又查,生怕有《聊斋志异》中的人物躲藏,可见,徐老师箫的演奏魔力无边!

徐老师夫妇琴瑟甚笃。在她弥留之际,李老师整个下午独自一人坐在病房外的凳子上若有所思。李晔看爸爸嘴里不停念叨着,后来才知道他在一遍一遍地背歌词。他说,谈恋爱时你妈妈唱歌给我听,现在她要走了,我要唱给她听。李老师俯身贴着徐老师耳边,用心为她清唱《红军走过的地方》《石油工人之歌》《Old Black Joe》时,徐老师最后的呼吸急促,胸口起伏,他相信,这是对他歌声的一种回应。

## 看菜花

□ 郭荣

高邮湖大桥,自从多了个“新民滩”的指示牌,早就想走一次。今天又激起了好奇心,走一次看看。

下得桥来,一大片菜花田跳入眼帘,车子在小路上穿行,微微的花香沁人心脾。阳光下,黄灿灿的枝摇曳着,似乎在打招呼:你来啦,你来啦!真是醉了,索性靠边停车。

今年的春,似乎来得有点迟,棉衣穿穿脱脱两三次。阳光下,全身的毛孔一下子舒展开。看到满眼的菜花,晃得耀眼,什么都不用想,就这么独处独享了。

小时候顽劣,喜欢菜花却不知爱惜,摘下来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老远被邻居看到,告状到家里,回去揪着一顿揍,爷爷说:一朵花一把菜籽,折了花就少榨了菜籽油。

有一年,去兴化看千垛油菜花。对于我们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孩子来说,油菜花并不稀奇,去千垛看,主要是其壮观,登上高台,一眼望不到边。小游船在垛间穿行,人在画中游,明艳的黄在眼前飘荡而过。

唯一遗憾,今年的油菜花没有蜜蜂围着花朵“嗡嗡嗡”,拍照也没了蜜蜂采花图。运输中断,养蜂人出不来。愿疫情早点过去。

## 远去的秧歌

□ 薛朝勤

老家苏北里下河,是一个水网密布的地方。这个地方有大面积的水荡、水田、水塘和错综复杂流淌着甘甜清水的河流。就连生长在这方土地上的动植物也离不开水,像水牛、水老鼠、水蛇、水田鸡等等,还有水稻、莲藕、菱角、慈姑、荸荠等水生植物几乎满眼都是。这些都给我留下深深的少年记忆。

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觉得里下河的水不但养育了这里勤劳朴实的乡亲,也孕育了水乡独特的文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我还是个十三四岁毛头小伙的时候,总觉得这里所有的大人都是文化人。不管在做什么农活,只要大人们高兴,一个个唱歌打号,张口就来,往往嗓音清亮,或高亢雄浑、或绵甜悠长,随时营造出欢乐祥和的氛围。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要数初夏时分,妇女们在秧田里,边插秧边唱秧歌的情景。

在那个年代,种水稻插秧没有插秧机,都是人工。每到夏忙,收完麦子紧跟着就要赶季节插秧。那时候,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劳力一般分成男女两队,男劳力多数干一些挑肥、挑秧的重活,而妇女们往往负责插秧。插秧时,先由男劳力把一把一把用稻草扎好的秧苗挑到田头,散发到整理好的水田里,然后妇女们在田埂边横向一字排开,人与人之间距约一米(约等于六行秧的行间距),开始插秧。

插秧称得上是个技术活,只见妇女们左手抓一把秧苗,右手从左手手中分出四五棵,以拇指、食指和中指捏在一起,娴熟地插进水田里。速度极快,且能保持插好的秧苗一行行笔直。她们每在前面插好两排,就自然向身后退一退,直到退到另一边的田埂,算是插完一趟秧。或许是同时开始插同样长度的秧的缘故,或许是一个生产队十来个妇女一起插秧的缘故,在整个插秧过程中,往往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似乎谁也不愿落在后面。

插秧毕竟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手忙眼快脚陷泥的活,一趟秧插下来,一般人都会腰酸腿痛。所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勤劳智慧的乡亲们,就有人想起用歌声来消除疲劳。插秧时唱起的歌,老家人叫作秧歌。

老家的秧歌,曲调一般都很固定,歌词都是四句,且如七绝般富有韵律。内容都是插秧妇女们即兴编出来的,或抒情、或自嘲、或调侃、或嗔怪,像互相戏谑,又像打情骂俏。在繁忙的集体劳动中,听歌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倒是真能消除疲惫,忘却辛苦。

我那时经常在放学时去田头帮忙,听了不少秧歌,也学会了调子,还记住了一些歌词,至今尚能想起。

准备唱秧歌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人起头。起头人说,要某某大姐唱一段好不好啊?于是会立即有人附和,好

声一片。经过半推半就后,就有人“敷衍”开唱:“叫我唱咪我就唱咪,唱的不好不要啊怪,赶着鸭子硬上架呀(好姐姐),我唱过了你就来。”

紧接着就有人“自觉”接唱:“姐姐唱歌嗓子尖咪,歌声强如蜂蜜啊甜,小心莫被哥听去呀(好姐姐),晚上后窗猫寻鲜。”

于是在满田的笑声里,一定有人“抱打不平”唱:“你把家猫看看好咪,不要让他块块呀跑,要不被人打断腿呀(好姐姐),你一辈子要苦熬。”

又是一阵笑声,在刚插好的秧苗尖上,随着旷野的轻风荡漾开来。一来二去,对唱开始有点“火药味”,这时又会有岁数稍大的人作“劝架”唱:“叫你唱歌你打浑咪,小心秧苗栽不啊深,秧栽不深好重栽呀(好姐姐),玩笑过头要伤人。”

于是田头会作短暂平静,但在一阵平静后,有时挑秧苗的男劳力也有滑头的,装腔作势“挑事”唱:“姐姐唱歌如抓痒咪,痒的(人)心里直瞎呀想,有心跟姐对个唱呀(亲姐姐),又怕(你)哥哥大巴掌。”

歌声一落,田里便又活跃起来,笑声不断,歌声不断。直到倒映着蓝天的一洼水田变成一片绿色,大家洗腿收工。

如今,那样的劳动场景已然看不到。随着改革开放和新农村建设,农村劳动生产力极大释放,老家人插秧早就用上了机械,甚至在农业科技的帮助下,就在割完麦子的田里,直接撒下芽好的稻种,再也不用弯腰驼背手工插秧。

随着手工插秧成为历史,老家人苦中寻乐的秧歌,也逐渐远去,远去……

## 我的爷爷

□ 晏锦

爷爷悟性不错,也愿意学,就将自己的瓦匠手艺悉数传授给了他。

到了农业学大寨时,全国到处兴修水利,里下河地区水多桥少,交通不便,于是各个人民公社建筑站应运而生,造桥建闸,大搞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爷爷听说后,加之思乡心切,立马结算工钱回到家乡。经熟人引荐,现场考核,爷爷很快被委任筹建公社建筑站,还做了首任站长。那个年代建筑站的工作还是挺不错的,收入比起农民种田“靠天收”强很多。

爷爷后来带着建筑站一班人做了很多工程,全国各地到处接活,建设了很多桥梁、道路和房屋,远的做到了东北沈阳,近的主要在司徒附近的几个乡镇,有些工程的名字当地人一说就知道,比如:柘垛大桥、三合轮窑、孙童烈士公墓、大卢拱桥等。由于时代发展,现在有些工程已经拆了,有些则仍在使用。

这些工程里面要说难度最高的,可能就是建三合大轮窑。那轮窑分上下两层,中间用楼板隔开,楼板中间留有数十个碗口大小的连通洞,既可以在二楼观察一楼的烧砖温度,也可以用来添加煤炭燃料。轮窑内部有很多半人高的烟道,走向复杂,相互联通,像是迷宫。据说建造时,我家西厢房地上铺的全是施工图纸,家人进出很不方便。轮窑的大烟囱,有四十八米高,内径还不小,只能

容纳一个人在里面施工,只有爷爷敢上。爷爷先在大烟囱里面搭脚手架,然后坐在脚手架上面砌砖,砌一层砖,身子就往上挪一点。砖和砂浆等材料则是靠外面安装有定滑轮的高架子牵引上去的,高架子底下有一个用来带动牵引绳的钢管转盘,需要四个工人同时用力,才能转得动。当时施工条件很艰苦,进度也很慢,每天只能砌两三米高。就这样,轮窑的大烟囱一天天地缓缓地向上生长着。竣工时,三合大轮窑在高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很多人特意撑船过来参观。

爷爷在任期间,帮助过很多困难家庭。那时候农村条件很差,很多人家生活困难,吃不饱,穿不暖,有些人就过来找爷爷,希望爷爷能带着他们的孩子出去挣钱、学本领、长见识。爷爷也是贫苦出身,深知农民生活不易,一般过来找他的,也都收了做工钱,见到有些特别好学肯干的,就收了做徒弟,传授他们手艺。后来,他的徒弟也大多成了师傅,每个春节都来给爷爷拜年。

爷爷勤劳一生,退休之后也没闲着。他开过一家小卖部,卖些烟酒日杂补贴家用。爷爷手巧,平时还在小卖部里扎斗香卖。在高邮,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要烧斗香。斗香的外形像宝塔,层数为单数,外面贴有金纸剪成的图案或文字,里面是空心的,用卷着木屑的报纸做骨架,整个斗香烧完就全化为灰烬。爷爷做的斗香扎实好看,很多人过来找他买。

爷爷去世时,我刚上初二,他走得很突然,临终前也没留下什么话。

我的爷爷是个手艺人,一开始学的是理发。那个年代的乡村剃头匠,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场所,挑个担子,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边走边吆喝:“剃头喽!”担子的一头挑的是水桶和架子,给客人洗头用的;另一头挑的是大木箱子,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剃头的工具,有推子、剪刀、刮刀、梳子、毛刷等。哪家要剃头,就把剃头匠喊到自家的院子里。每次剃头时,旁边总有不少人好奇地围观着,像是看杂技表演。

爷爷30岁那年,高邮发生自然灾害,庄稼收成不好,农民没人舍得花钱去剃头,爷爷迫于生计,就挑着剃头担子随年轻人去安徽谋生了。有一天,爷爷在一户人家院里剃头,刚好有个高邮的瓦匠老师傅,姓吴,卸甲人,在给这户人家砌厨房,小青砖砌得叠角展方、缝口笔直,非常好看。爷爷是个爱钻研又好学的人,看到这位同乡老师傅手艺非常好,又觉得做瓦匠比剃头匠更有前途,就萌生了改行学瓦匠的念头。

爷爷很仔细地看吴师傅砌墙,趁他喝茶的间歇,主动凑前搭讪,并流露出拜师学艺的想法。吴师傅半真半假地说:“你要是明天能把这灶台砌起来,我就教你。”没想到爷爷当真了,一晚上没怎么睡觉,脑子里一直回想着白天吴师傅是怎么砌砖的。第二天,天还没亮,爷爷就起床干活了。等吴师傅吃完早饭,过来开工的时候,发现爷爷已将灶台砌了一半,很是惊讶,夸赞爷爷是个做瓦匠的好苗子。吴师傅兑现承诺,收了我爷爷当学徒。拜师之后,爷爷跟着吴师傅在安徽做了很多活。吴师傅人挺好,见